

# 憶胡適之先生

賴景瑚

——「不但腔子裏有哲人的心，口角上還露出嬰兒的笑」

我和適之先生第一次見面，是七七事變前一年在上海一個康奈爾大學同學會的餐會上。他問我在康校的年級，便笑道：「你還是一個嬰孩（Baby）」。我對他說：「我雖然沒有做過胡先生的學生，但是受過你很大的影響」。是的，我不但受過他的影響，而且一直喜歡讀他的文章，聽他談笑風生的議論。

當他和陳獨秀等在北京辦「新青年」雜誌的時候，我正在湖南長沙讀中學。我經常看他們的文字，不知不覺的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信徒。我對他們所提出的有關政治和社會改革的許多主張，只覺得很新奇，很够刺激，並沒有甚麼深切的了解。唯有胡先生文學革命那一點，我認為是「普及教育」所必需。我也相信白話文可以使中國文字從古老、陳舊、一變而為有生氣、有活力。

可是，我的國文老師大大的不以為然。他說：「白話文俚俗、粗鄙、淺薄，不能登大雅之堂。」我曾和他爭辯。有一次，我很大胆的在我每週繳給老師的作文本上，倣照胡先生的筆調，大做語

體文章。我便是這樣觸怒了那位老師。他不但在講堂上痛罵「新青年」那一套是異端邪說，而且請校長記我大過一次，還出一張佈告，把我申斥一頓。

## 他使我下決心赴美國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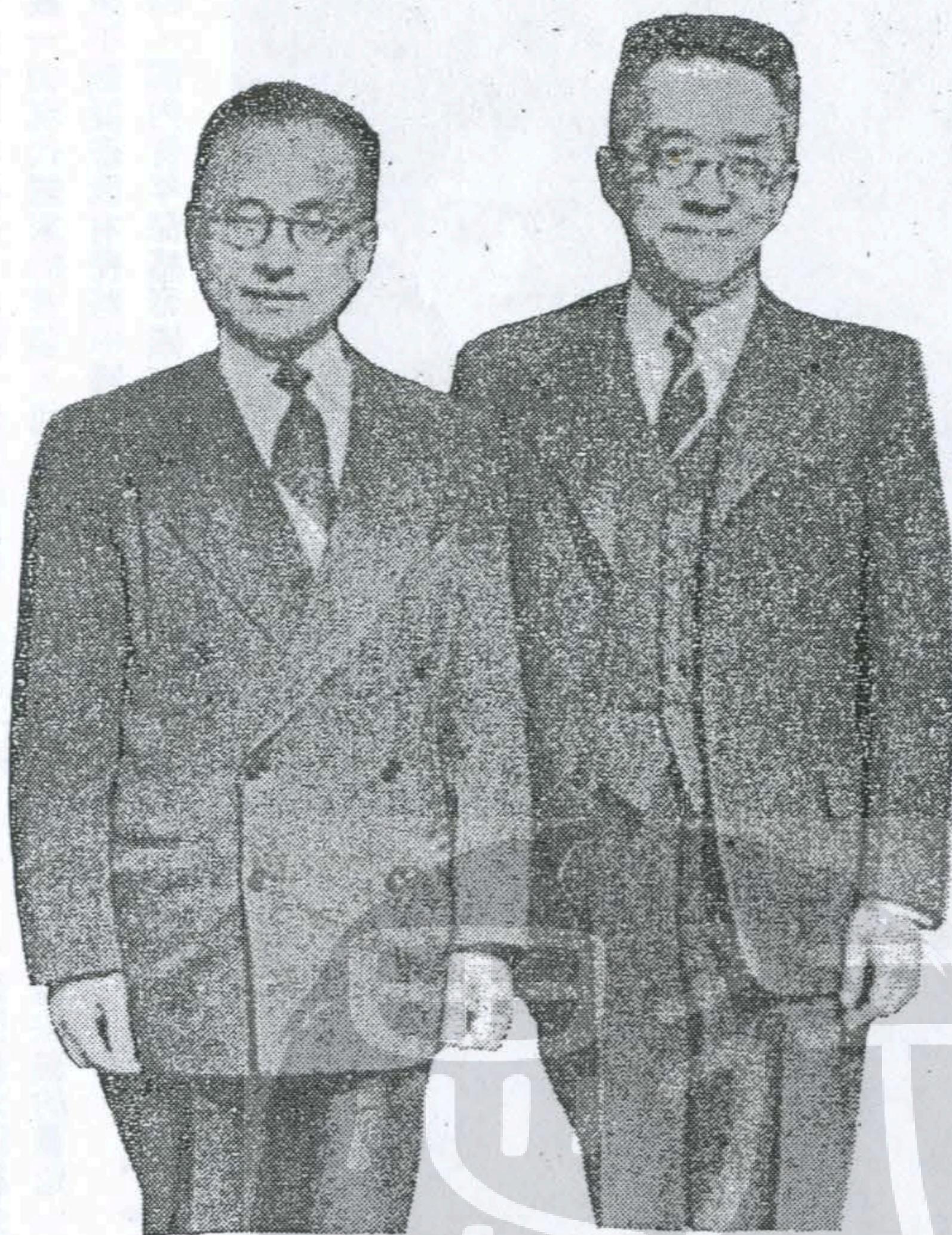
那是半世紀以前的事了。我記得後來我讀完中學，就不顧家庭的反對和社會的阻撓，跑到美國去做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生。當時我年紀雖很小，決心却很大，也有一部份是受了胡先生的影響。本來，我自幼便抱有救國的志願，但不知道甚麼是救國的途徑。我的小學教師說過：滿清的推翻和民國的建造，都是海外歸來的留學生所發動的。我那幼稚的心靈，就以為我要完成救國的志願，就非先到外國去求高深的學問不可。

可是，在我所聽見的那許多外國當中，我應該到那一國去呢？我的小學教師不少是從日本回來的。他們雖指日本為仇敵，但叫我們要學日本

作過一次「留日」之夢。不久，我在報紙上看見所謂「勤工儉學」的宣傳，又對「留法」動了心。等到我進了美國人在長沙所辦的雅禮學校，我初次和美國接觸，也初次探知一點美國歷史、文化及宗教的概況，我乃一心嚮往那個民主自由的新大陸。

然而美國那麼遙遠，費用又那麼昂貴，「留美」談何容易。我雖然得了美國老師的鼓勵，但是依然不敢隨意作「冒險」的嘗試。我最後之所以下了留美的決心，而且遠走高飛的橫渡了太平洋；我不能不歸功於「新青年」雜誌給予我的無窮勇氣。尤其是胡先生對於留美生活的敘述，既引起我對美國大學教育的濃厚興趣，又使我把他的母校康奈爾大學，當作我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 抗戰勝利時的「五胡亂華」



本文作者和胡適先生一九四九年攝於紐約。

我在美國留學的那幾年，一面勤奮讀書，一面做工自給，對於國內的事雖多隔膜，但對於心儀甚久，復在文教界已負重望的胡先生，總想有一天向他面請教益。可是，我回國以後，服務京滬一帶，只在上面所提及的餐會和他匆匆一晤。一直到抗戰勝利，他出使美國歸來，重任北大校長；他到南京參加國民大會，陳果夫先生宴請幾位大學校長和在聯合國任職的胡世澤先生，我才第二次和他見面。我當時發現在座的賓主十

二人中有五個人姓胡。適之先生很詼諧的說：「這難道又是五胡亂華嗎？」就在那一年，中華民國頒佈憲法；有人主張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應該由一位有國際聲望的學人擔任。我也覺得中國如以文人爲元首，可以在世界上產生良好的印象，所以不但贊成那個意見，而且認爲胡先生是一位可供國民大會考慮的適當人選。國民黨的總裁蔣先生，聽說也有這個意思。很多人還說蔣先生親向胡先生徵求過他們的同意。

我那時是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也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和國防最高會議。我們在這些會議裏，雖然知道總統人選是很重要，也是很微妙的問題，但是除了非正式的交換意見外，從來沒有把它當作熱烈爭辯的議案。也無人在發言中提到胡先生的名字。

當國民大會正在準備推選總統的時候，那一心要勾結蘇俄去奪取政權的中共，已在東北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朝野上下都

感覺到軍事的嚴重，幾乎一致深信主持國家大計的一定要一位既得人民擁護而又能整軍經武的領袖。國民大會便是這樣代表了全國民意，選出蔣先生爲總統。

### 紐約重逢後的慨歎和辯論

我於一九四八年由教育部派赴美國進修，又代表中央海外部慰問美國和加拿大的華僑。想不到，國事因戰局惡化而急轉直下。不出一年，中國大陸竟不幸被中共所竊據。我在紐約遇見了從和平逃出不久的胡先生。我們晤面時相對黯然，差不多說不出一句話。我問候了他的健康。他也告訴我許多關於中共摧殘教育，迫害知識份子的悲慘故事。其中還有幾件，涉及我的幾位在教育界的老朋友。

然而，胡先生始終對祖國有堅定的信心。他說復國的前途，雖然荆棘甚多，困難重重，但是，這班滅絕人性的中共，必爲中國人民所唾棄；而那違反民主自由和時代精神的共產主義，也一定爲這個世界所不容。我很欽佩他的卓見。他這一番話也增強了我要清除赤禍，光復大陸的信心。

他談了一陣，忽於嗟歎之餘對我說：「今日共產黨如此猖獗，我們自然很痛心。可是，我不能不把這個責任，歸於聯俄容共的始作俑者孫中山先生」。我雖因尊敬他而不願和他爭辯，但是我立刻覺得他的論斷不公道，便對他說：「我認爲國民黨沒有把國家弄好。應該引咎和認錯。可是

，他如不在外交上打開一條新的出路，便沒有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的希望。他以君子之心待人，從來不懷疑蘇俄有侵略中國和征服世界的野心。同時，國內青年深感帝國主義的壓迫，的確有不少

人傾向那個以打倒帝國主義當作口頭禪的蘇俄。中山先生想把那班青年都吸引到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一面固然是團結全國的革命力量，一面也是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

### 蔣廷黻氏和自由黨的流產

胡先生仍然

覺得我是以黨員立場，去替中山先生辯護。他說

「你的話未嘗沒有道理。可是，我還是以為共產黨的坐大，是起源於國民黨的容共」。我反問胡先生是否承認邪惡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乃為今日世界一個極反動的逆流。我說：「歐美各國不都是被共產黨所困擾嗎？他們並無中山先生其人，更無他的聯俄容共的政策。事實上，中國如果

以前接近一點。我力勸他對徧徧憂懼的留學生多作奮起救亡的鼓勵和領導，也多向外國朋友申述我們反共復國的決心。我當時在紐約，邀集很多不分黨派的愛國人士，組織對抗極權暴政的民主自由聯盟。于野聲（斌）主教和曾慕韓（琦）先生都對那個運動很熱心，很想把它變成反共復國的號召。胡先生說他既決心「不問政治」所以不願參加任何組織。後來，我因籌措經費不易，國內又有人造謠中傷，也就停止了民主自由聯盟的一切活動。

就在那個時候，那位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的蔣廷黻先生，忽然有意組織中國自由黨。他和我商談了好幾次；並說他將擁戴胡先生為黨魁；他也可以獲得英美兩國當局的支持。我說胡先生一再聲明他從此不問政治，恐怕不會願意接受這個黨魁的頭銜。他說，他心目中的黨魁，是和甘地一樣的只作精神的領導，那個國會黨的實際負責人，不是甘地而是尼赫魯。他顯然是以尼赫魯自居而要把胡先生當作中國的甘地。我當時因不肯放棄自己的固定立場，拒絕參加他的新黨運動。胡先生自然也沒有做黨魁的意思。他的所謂中國自由黨，便是這樣很迅速的流產了。

我會把蔣廷黻組黨的事問胡先生。他說：「我不反對他組黨，但我一本不問政治的初衷，決不參加，更談不上做黨魁」。我又問他：「國民大會開會的時候，國民黨的蔣總裁是否有意推他為



總統候選人。他說：「是的，我至今對他有知遇之感。聽說你們這班中央委員都反對我。」我說：「據我所知，大家對總統人選雖然各有不同的意見，但對胡先生都是很尊敬的」。那時胡先生早已知道我和實際政治脫離了關係，所以相信我講話很客觀而沒有成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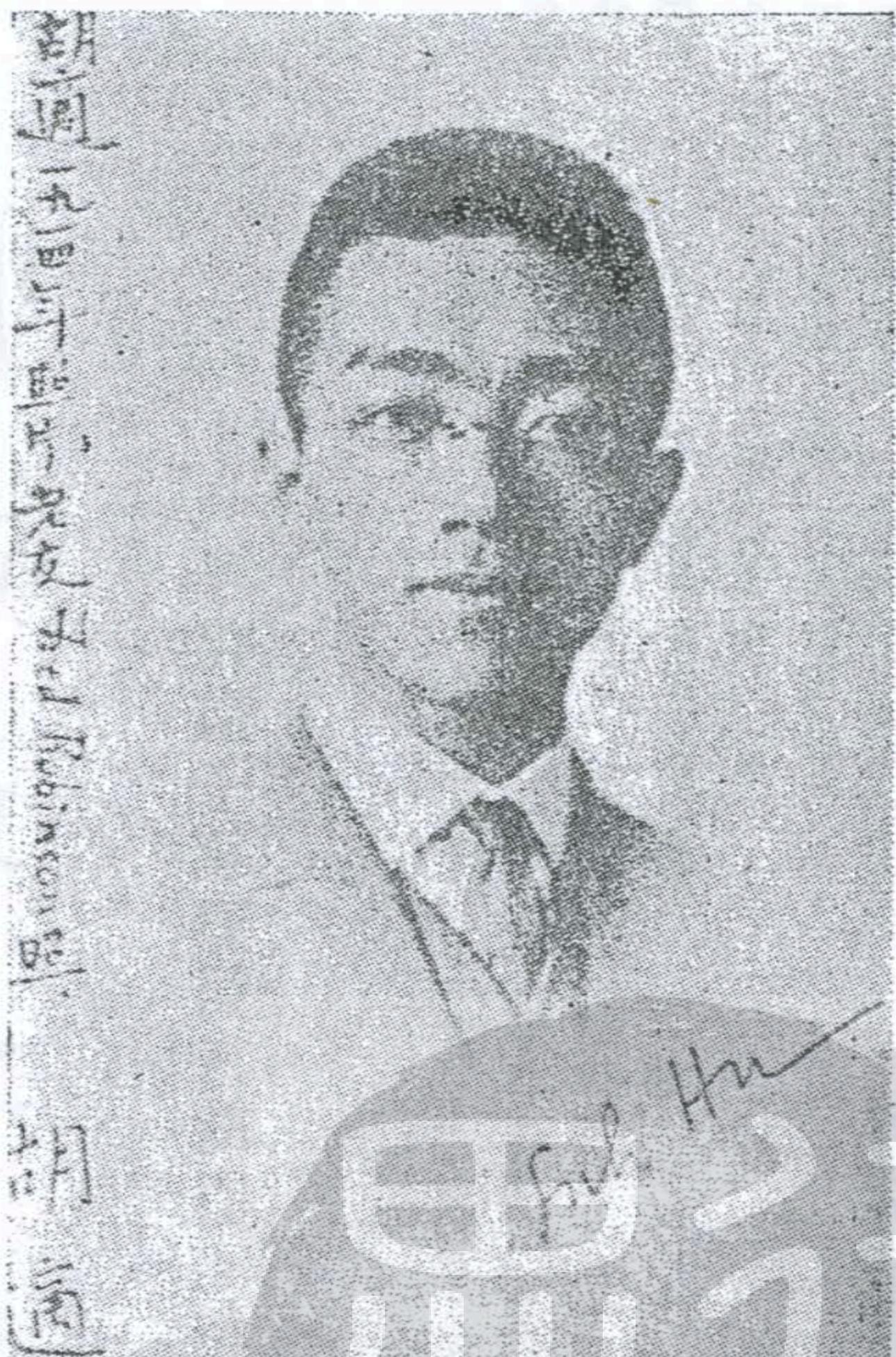
### 由聯合國的文件談到翻譯

胡先生從一九四九到他回國就任中央研究院長職，都在紐約居住，因此，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多。我無論是聽他論學問，或談時局，均有如坐春風之感。一九五一至五三之間，胡先生在普林

士頓大學負責整理一大批別人捐贈的中文圖書。我在附近一女子大學任教。我的同事中有一捷克籍的女教授。她的姓氏和胡適二字完全同音。她說那是捷克一個很普通的姓氏；問我可否介紹她和胡先生晤談。我便引她到普大見胡先生，並為這兩位「胡適」合照了一張照。胡先生那天見了這位外國「本家」，覺得很有興味。他興高彩烈的引導我們參觀他所整理的全部中文圖書。

我於一九五三進聯合國祕書處，主持中文翻譯部門。有一次，我邀集翻譯人員聚餐，特請胡先生以長者資格作訓話式的指示。他很謙虛的說了一些客氣話以後，便坦率的指出聯合國中文文件的許多缺點。他尤其不喜歡由外國文直譯出來的文字。他說：「那些文字讀起來，不中不西，不知所云。我與其花費時間去看那種譯件，不如直接了當的去看原文」。當時就有人駁他：「凡要從這些文件找資料或尋證據的，不見得人人能讀外國文」。

他又說：「嚴又陵先生所說的信、達、雅三點，固然可作翻譯的準繩。但是，為要使聯合國刊行的東西像中國文件。又要使中國人看了有興趣，我



胡適  
一九五一年夏  
于普林斯頓大學

民國三年，胡適博士在康奈爾大學

就讀時攝。

### 加州大學校園旅邸的訪問

我於一九五六年秋天，環遊世界，從台北到了美國的舊金山；正當胡先生也自紐約到伯克萊城的加州大學講學。那時匈牙利的人民，發動反蘇革命，全世界都對那個由反蘇變為反共的運動，寄予無窮的希望。我特往加大校園附近的一個旅館，訪問一別三年的胡先生。他容光煥發，談鋒甚健。他說匈國事變對中國、對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談了兩小時，我還覺得時間太短促。從中國現狀到世界大勢，從中共清算胡適思想到東歐衛星國的反共潮流，胡先生都廣徵博引，滔滔不絕。他使我印象最深的，不僅是他見聞豐富，而且是他對於中國和世界的前途，充滿着樂觀，希望和信心。我那天的日記便是這樣記下來的。

胡先生又說他本人對政治一向沒有興趣，今後他也不願意參加實際政治。但是，他覺得中國在現階段下根本不需要任何政黨的組織。他因為要強調民族主義在反共鬥爭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主張要救國，就不必要有政黨；人民本身便可以

產生推翻極權暴政的力量。他認為政黨的存在、政黨的作風，甚至政黨的觀念，都是和自由主義相抵觸的。

這當然是一個不大行得通的理想。可是，我要保持那次訪問的和諧氣氛，只有靜聽他的意見，也幾乎把這一件事忘記了。我回紐約不久，聽說胡先生又把他的那個主張，對一位從台灣到美國的新聞記者重述一遍。這個消息便立刻傳播到台北和香港，掀動了一場所謂「毀黨救國」的爭辯，也引起了一點不愉快的誤會。

紐約也有人批評他的主張



(上)民國二十七年時的胡適博士。

胡適一九二七  
胡

適

多謝客來書，  
裝着半分情意。  
只有一分不滿，  
帶些微寒氣。  
十年萬里的分離，  
生疏也難怪。  
只我閑誠歡喜，  
故態依然在。

胡先生雖常說他對政治無興趣，但他對政治是有熱忱、有思想，也有勇氣去發表他的議論，甚至不顧一切的堅持他的意見的。他那不贊成中國有政黨的主張，既在台灣香港一帶引起了爭辯和誤會，他仍然不動搖他對他那主張的信念。一九五七年的初

春，他在紐約華美協進社發表了一篇演說，不但重申他的一貫的主張

，而且說台灣

當局應該廣開

言路，不可缺乏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容忍精神。

他那天說話相當激動，並有一點怒容，我當時很替他的健康擔心。但在散會的時候，他又笑

容滿面的和我們話別，還說他不久就要回台灣去。過了幾天，紐約華美日報忽然刊登了一篇「聽

了胡適演說以後」的

來論。那位署名「如心」的投稿人，自稱

他是素來敬佩胡先生的，但對胡先生那天的演講表示異議，希望胡先生也以容忍的精神去看他的文章。

這位「如心」先

生一開始就說：「胡

先生不知受了甚麼刺

激，禁不住用了許多

武斷的詞調，抨擊中

國的各黨派。共產黨

當然是他深惡痛絕的。

國民黨也被他加上

很難聽的形容詞。青

年黨和民社黨更被他

奚落了一頓。我和胡

先生一樣，反共產、

反極權、愛自由、愛

民主，可是我不能同意他那種抹煞一切的

言論，雖然我深信他

生先之適胡憶

是有救國的誠意的」。

後來我聽見那作者是一位退休已久的國民黨員。胡先生那晚對中山先生有微詞他也很不高興。他說：「胡先生一向崇拜西洋文明，主張全盤西化，不知還記得遠在五六十年前，中山先生已在積極宣傳最進步的政治思想，和趕在時代前面的社會思想。近年中國建立了一點現代化的基礎，和一點民主自由的規模，平心而論，我還是不能不歸功於中山先生。」

###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的悲哀

胡先生回國主持中央研究院以後，雖然有時也來紐約接洽公務；但是我們晤談的機會就比以前減少了。我於一九六二年的一天，忽然聽見他於二月廿四日在台逝世的消息，真如晴天霹靂一樣，既震驚，又悲戚。國家失去了一位最卓越的導師。我亦失去了我自幼就很崇敬的長者。我一九六四返台，特到南港拜謁胡墓，又至其舊居低徊憑弔，實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的悲哀」。

這若干年，海內外悼念胡先生的文章，我看的不少。我只記得我們在紐約開追思會的時候，林語堂先生曾說：「適之先生在道德文章上，在

的哲學體系。

他的得意門生羅志希（家倫）先生曾於胡先生六十二歲的時候，送他一首詩。其中有一節是：「你，六十二歲的鬥士。到現在不祇有鬥士的精神，還有孩子的天真，不但腔子裏有哲人的心，是哲人。但是他最可愛的地方，還是他那顆天真口角還露出嬰兒的笑」。是的，胡先生是鬥士，是哲人。但是他最可愛的地方，還是他那顆天真

的赤子之心。

這首詩另有更精彩的一段。那就是：「人家說你和易近人，可是在正義和主張上，你却能和

同強哉矯。」我完全同意羅先生的看法。我上面敘述了一點胡先生的主張和辯論；我不一定贊同他的意見；有時還覺得他把一個問題看得太簡單，甚至有點近乎固執和偏頗。可是，我始終佩服他的信心、勇氣、樂觀的希望，和為真理而奮鬥的精神。志希先生的這首白話詩，最能概括我對胡先生的崇敬。我今天回憶胡先生的嘉言懿行，同時也想念這位追隨胡先生於地下的現代詩人。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日於紐約）

## 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

第二輯 最新出版 定價拾捌元

人物傳記，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執筆名家，陣容之堅強，極一時之選，既富史料價值，又饒有閱讀興味，篇篇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佳構。頃應讀者要求，精選富有代表性的名家雷嘯岑、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印行第二輯，訂價十八元。

### 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目錄

雷嘯岑	楊永泰龍蛇起陸
易恕孜	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
徐荻芬	慈禧的一生
王俊士	丘逢甲和廣州光復
姚蒸民	鄧家彥口述革命珍聞錄
趙淑敏	黃仲則綺懷不了情
高鳳英	蕭伯納絢爛一生
王成聖	達賴十三世的悲劇
王培堯	林覺民伉儷情深、梁任公祕密戀史，羅瘦公與程硯秋